

論
忠
誠
與
老
實

1945.4

林
聰
長

韓
初
學
習
文
件

世
嘉
會

20/5

論忠誠與老實

斯列波夫等著

東北書店印行

目 錄

論忠誠與老實·····	一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布爾塞維克的嚴肅性·····	七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布爾塞維克高貴的品質·····	一四
論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	二一

論忠誠與老實

斯列波夫著
齊生譯

忠誠老實——這是列寧、斯大林型的工作人員之確定不移的特點。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黨的與蘇維埃的幹部，要像列寧那樣忠誠與老實。布爾塞維克在其工作中與生活中的每一舉措，均需培植與發展這種優良的品質。

要忠誠——這就是說：『要像伊里奇經常作的那樣，像每一個布爾塞維克都應該作的那樣，將全部真情率直而老實地向黨坦白出來。』（斯大林）

黨對每個布爾塞維克所要求的忠誠與老實，是在實際工作中來檢驗的。一個共產黨員不論其所處何種職位，他都應該有勇氣批判地估價自己的活動，說出自己活動的真情。在政治上的忠實，完全要由『言行一致』（列寧）來檢驗。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最重要的布爾塞維克的原則——不是按照人們的言詞、諾言、報告來評判人；而是按照人們的行為來評判人。

布爾塞維克的話——是固定不移的話。領導者，公務人員是不能隨便說話的；話既說出，那就要表現決心毅力，並執行自己的諾言。如果你因為什麼原故盤算錯了，力不能勝——那你就老老實實說出這一點。否則你就是以饒舌者和騙子的可恥角色來說話。

列寧說：當一個人『言行不一致時，這就完全糟了，這會導向偽善』。

自然，當說到以忠誠的精神來教育幹部的時候，這就不僅是指這個字在普通意義上的忠實，而且也是指善於在每一件（即令是最小的）事情，從整個國家的利益，從黨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地方的，尤其不是從純粹私人的。

布爾塞維克黨——蘇維埃人民的先鋒隊，蘇維埃人民偉大的創造性勞動之領導者——是以國家的全民的利益之深刻意識的精神來教育全體勞動者的；這尤其指的是負責領導的幹部。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與實際證明，我們的幹部是如何深刻地了解整個國家的利益，他們如何不可調和地對待各種反國家利益的現象，這在蘇維埃羣衆完成着的成千愛國事件的例子上就可以看出。

同時也有這樣的情形，有時某些工作人員將國家的利益置於腦後，爲了取得獎賞或隱瞞缺點，這樣的工作人員就粉飾真情實況，走上了哄騙國家，欺詐和捏造的邪路，而故意的提出不合實情的關於執行國家計劃的報告。

由某伊凡諾夫負責的建設局的領導者們，在好幾年中提出的關於建設情形的報告，都是假的。按照這些報告，有一百三十件計劃『卓越地』和『很好地』建設好了。其實，其中六十五件是不完全的和不適於經營的。爲了這些誇張的數字，建設局在兩年過程中，得到了兩百萬盧布的獎金，其中伊凡諾夫個人就得到了十萬零三千盧布。奧木斯克州黨委會和中央建設局的領導者們，沒有即時注意這些欺詐和捏造，而是很久以後才把它們揭發出來。雖然類似的情況爲數不多，黨的組織仍不能無視這些情況。事業的利益和幹部的教育，要求黨的組織不能無視任何一件非法的事，而是有責任給它們以反擊，以忠誠的老實的對待國家利益的態度來教育工作人員。

無須證明：及時揭露缺點是較易消除的，當人們不及時地講出真情，隱藏缺點，而最後使工作中的失敗暴露出來的時候——那就要糾正，形勢就非常困難了。由此可見，工作人員是應該有勇氣講出真情，不粉飾現實，指出事情的實際狀況，及時地揭露缺點，並指出其根源。黨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不應該將地方的利益提得過高，而應該如實地反映本區的企業的集體農場的情況。我們每個工作人員的本份，不要將被曲解了的個人威信高於一切。

對國家的不老實，常常表現在不願意肩負緊張的但是完全可能完成的計劃，表現在企圖以各種藉口逃避計劃的執行；表現在極力想得到其實沒有也可以的國家的補充資材。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者，無須外界之督促，也無須訴苦，就盡力超過國家所予的任務，去尋求新的儲藏，俾使其熔於總的國家洪爐中。一心為國家的人民的利益服務。

來自上級的最詳細的計劃及正確的指示，是不能夠預先估計到當地所有的全部可能性的。如果在工作的過程中發現了新的儲藏，布爾塞維克不能也不應該將他們隱藏起來。他對誰隱藏它們呢？對自己的政府嗎？對自己的黨嗎？隱藏儲藏只能是這樣一些人的事，這些人將其衙門的鐘樓看得高過國家的黨的利益。

這些允許自己對國家耍狡猾的人們，是容易屈服於落後的傾向的。他們對橫在我們路上的困難，時刻準備加以誇大，又常常沒有表現勇氣與決心的魄力，希望不負責，把自己的責任推給別人——這是對國家完成義務的不老實態度的表現之一。害怕負責並按照『不要出了什麼岔子』的原則去作事的膽怯鬼，是沒有能力將事情推向前進，改善它，並表現創造，與主動性的。

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教育幹部，這就是要以工作人員自己的錯誤與缺點來教育他們，這是斯大林對布爾塞維克幹部教育的珍言之一。

斯大林教導說：

『布爾塞維克的責任，就是不掩蓋自己的錯誤，不逃避有關自己錯誤的問題（像我們常常發生的那樣）；而是老實而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老實而公開的謀求糾正這些錯誤的方法，老實而公開的糾正自己的錯誤。』

有這樣的事實，某些工作人員逃避承認自己的錯誤，以為承認錯誤有傷工作人員的名譽，會有損其威信，這是對威信的正確而虛偽的了解。實際上，承認自己的錯誤，準備糾正錯誤，是不會損傷工作人員的威信，反而會提高其威信的。必須記住列寧的金玉之言：聰明的不是那些不犯錯誤的人；而是那些犯了錯誤而不很嚴重，並善於敏捷而迅速的糾正錯誤的人。

費力克斯·特捷仁斯基說：

『會失去聲望的只是那種隱蔽自己的缺點，不願意同醜惡鬭爭的人；也就是那種本應失去聲望的人。必須學會正視真理，並從羣衆及一切參加生產的人們那裏去把握真理。再沒有什麼比自吹自擂與自滿更壞的了。只有當你一步一步地搜索醜惡並征服它的時候，你才能够前進。』

批評與自我批評，乃是在精神上教育幹部忠誠與老實的最重要的方法；用平常的格言『家醜不可外揚』來進行領導是不可能的。

在黨選擇幹部的原則遭受破壞的地方，是最容易發生這種類似的非布爾塞維克的風習；誰接受了

不許可的選擇幹部的方法，誰就造成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負責工作人員的領導集體被排斥了，而代替它的却是盡力和平共處而不相互批評的親人、小家族，行幫。在這種土壤上，就繁殖着庸俗的劣根性，而有時就產生對國家利益的不誠實態度。

批評與自我批評，可以使缺點適時的揭發出來。錯誤如不隨時予以糾正，即會滋生新的錯誤。並最後毀滅工作人員。下面就是一個可作教訓的例子：

安得列夫同志最近四年間，在薩拉托夫城市蘇維埃執委會擔任第一副主席。還在他擔任這一工作的開始。他就犯了一系列嚴重的錯誤。黨的市委會與州委會接到了很多對安得列夫同志行爲的控訴，但是他們並沒有及時向他指出錯誤。他自高自大，而且自認爲沒有錯誤的。安得列夫濫用職權，褻視蘇維埃其他委員的權力，擅自取消區蘇維埃的決定，並脫離羣衆。在一次州委會的集會上，他聲明說：『我有很多比接見勞動者更嚴重的事情，我沒有時間傾聽控訴。』

雖然這一切對安得列夫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却終於被撤職了。如果人們及時的向安得列夫同志指出他的錯誤，而不是由於朋友的關係，掩蓋了這些錯誤，那麼可能他還會作爲一個工作人員而被保留。憐惜『幹部的自尊心』認爲這對於他們就是作了有益的事，是不對的。沒有比這種觀點更錯誤的了。以掩蓋幹部的錯誤，來憐惜和保存幹部，等於實實在在的毀滅這些幹部。勇敢的澈底的和客觀的批評——這是教育幹部的基本方法，這種批評會幫助成全幹部、刺激前進、克服困難。

基洛夫說：

『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實踐，從來沒有過於平穩的關係，我們是會激怒……我們中間誰要是

以這種或那種考慮，認為算了吧，說了不好，我還是最好不說，不去批評，那誰就要成爲罪人。應該老老實實的按着布爾塞維克的方法，直視同志的共產黨員的眼睛，向他說：「你，親愛的人，你被絆倒了，纏住了；如果你自己不能起來，我就來幫助你；如果拉住手也不能拉起你，我就來拉你的頭髮；我要盡一切可能糾正你。但如果你，親愛的人，不糾正過來，那麼你就責罵自己吧，你得滾到旁邊去！」」

以忠誠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沒有日常的嚴格的監督，對執行沒有完善而熟練的有組織的檢查，是不可能的。黨的組織同工作人員的關係，不能建立在盲目的信任上。黨的領導和監督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認出工作中的缺點，很快的提出方法糾正它。沒有執行完善而熟練地加以組織的檢查，就不可能保證適時地揭發缺點，並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以布爾塞維克對所負責任之責任心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如果工作人員知道監督是實實在在的，誰也不能將破壞指示的事馬虎混過，而不爲人所知——那麼僅此即足以使他緊張起來。

爲了勝利的完成前後五年計劃的任務，黨的組織在工作上就更嚴格，就更要培養工作人員那種對國家，對人民的崇高的責任感，對於一個布爾塞維克國家的全民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布爾塞維克的天職，就是隨時隨地小心地保護自己的榮譽與美德，因爲這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政黨的榮譽與美德。在全體蘇維埃人民的眼中，一個黨員應該在一切事情上是先進的人，其德性引起普遍的崇敬與做效之心的人。（譯自真理報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

布爾塞維克的嚴肅性

斯列波夫
蘇 瑛 譯

共產黨是反對停滯不進及保守主義的死敵，從來不滿足於已獲得的成績，而總是向前看。從我黨的本質及其革命的精神中產生了對缺點的布爾塞維克的不調和性。『對本身缺點無情的揭露，是一切生動活潑的政黨所必需的。沒有比自滿的樂天主義再壞的事了』。（列寧全集七卷三百零七頁）

驕傲，自負，泰然自若和布爾塞維克黨人是沒有因緣的。列寧和斯大林責叱這樣一些工作人員，對他們來說，只要有某些成績就足以使他們苟安自滿，而忘記缺點。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這部份人說『只要有兩三個大的成就就已自空一切，要再有兩三個大的成就，就驕傲起來百事不在乎了。』

對缺點表現布爾塞維克的不能容忍態度，這就是說，不因勝利而衝暈頭腦，不因即使是很小的誘惑而鬆懈工作，清楚地看見尚未解決的問題，要正視錯誤。

大家知道，如果不讓缺點發展下去，那它是比較容易改掉的。錯誤經常是從很小開始，可是當它不被人所注意的時候，它就發展成大的錯誤。『所有的人都可能腐蝕，但假如這腐蝕開始腐爛時，就可能變成不治之症。』（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九十九頁）我們應該培養自己最寶貴的品質——當缺點

剛一發生的時候，就要善於看出 揭穿，並預防它。因此，有些個別的工作人員，害怕對自己不如意，而杜撰各種藉詞來掩蓋或者迴避缺點，以『故作清白』，這是不可容忍的事。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人不能以個人利益或者暫時利益的觀點去對待事物，他應該永遠站在國家利益之上，客觀地估計工作中的優點和缺點。

不隱瞞缺點——這是對領導者不變的要求，但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而重要的是善於誠心誠意地揭發產生缺點的根源及找到糾正缺點的方法。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人，不能夠逃避責任，不能在困難面前低頭——他必須傾其全力來克服它。假如工作人員只知道悲嘆困難，而不真正的同困難作鬥爭，那有什麼用處呢？！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表現在布爾塞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上。如不公開批評並分析缺點，那怎麼叫做揭發缺點呢？批評及自我批評，是我黨所掌握的真正動力和強大武器。

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是暴露和糾正領導方面錯誤的方法，是正確教育幹部的基本方法。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斯大林同志說：『我認爲要沒有自我批評，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揭露我們的瘡痕，就不能消滅我們的缺點。』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這就是說，領導者應該是在工作中很嚴肅，不是馬馬虎虎，不是以家庭親友的方式決定問題，而是有高度的嚴肅性，這才能即時揭露缺點，找到糾正缺點的途徑，正確地教育幹部。

真正的嚴肅精神，不容因『職位』和『功勳』而有所遷就。它應該同樣適用於好的和不好的工作

人員。可惜，並不經常是這樣的。有人常常認爲：這種嚴肅精神只拿去對待不好的工作人員，把它看成是領導者手中的特種鞭子，專爲對付懶散的人使用的。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它有害於工作及幹部教育。拿這樣的事實作例吧：就是以阿赤金同志所領導的薩拉多夫省「新布拉斯」機器拖拉機站，在很長時間中都被認爲是先進的站。該站一切工作都作得挺好，它底領導者受到無限的讚揚，但沒有指出他們工作中的缺點。因此阿赤金同志也覺得自己真正是十全十美的人了，而自滿自足起來了。到收割莊稼的時候，他說道：「我們沒有什麼可着急的，反正我們會先收割完。」這樣鬆懈的結果，使得該站很遲的才開始收割運動。而結果怎樣呢？結果阿赤金同志所領導的機器拖拉機站在收割方面落後了，並拖晚了被它供給拖拉機的各集體農場的收割。

就是很好的工作人員，也不保險不犯錯誤。沒有缺點。要是缺乏這種嚴肅性，就是好的工作人員，對待自己工作也沒有批評的精神了。

布爾塞維克的嚴肅性，就是說要根據人們工作的效果來審查他們，這種審查，不是根據某種片斷的「突出」工作，而是根據經常的工作。不斷的對執行指令指示加以監督，能培養工作人員的準確性及嚴肅性。不管你說了多少關於紀律的必要及好處，而作出的決議很快就被忘記的話，那就會廢弛紀律，發生散漫，結果責任心就一定喪失。

要有嚴肅性，這就是說要這樣地組織領導，使得任何破壞黨的指令的行爲不能不受到追究。在這一方面，起着很大作用的不僅是自上而下的審查，單單這樣還不够。斯大林同志曾指出自下而上進行審查的重要性，即被領導者審查領導者，揭發他們底錯誤，指出糾正這些錯誤的辦法。黨員羣衆在積

極份子會議上，在代表會議上，來審查自己底領導者的方法，就是聽取他們總結報告，批評他們的缺點，選舉或不選舉他們到領導機關去。沒有這樣的審查，就不能夠用對錯誤和缺點的不調和精神來正確地教育幹部。

工作中的嚴肅性和官僚管理——粗暴的叱責，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官僚管理是一種無知的產物，是缺乏領導的結果。不會研究事物底本質，不會正確的配備幹部，企圖個人獨斷一切，不吸收僅事的人參加，不研究羣衆的經驗，不考慮黨工作人員集體的意見的地方，就有這樣的現象。

官僚管理，就是說命令和領導不依靠積極份子，而領導的任務恰在於團結積極份子。需要組織各種不同部門工作人員的配合行動，以便「推進工作，不是各自爲政，各幹各的，而是應該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因而獲得成功的最大保證」（日丹諾夫語）。

伴隨官僚管理而來的，照例是時常調換幹部，殊不知處理幹部的組織工作本身，就包涵有教育的成份。好的領導，首先是教育和訓練幹部，並給他們以實際的幫助。當然，處罰也有其教育意義，但要是濫用處罰，就不成其爲教育的方法，因爲幹部會對處罰不在乎了。

也有這樣的情況，需要堅決的處置時，而領導人却去進行勸說，看到工作人員有過失時，領導者却猶豫不決以自由主義的態度代替了處罰。

就拿聯共（布）烏得慕爾特省委的事實作例子：在這裏，沒有對待工作人員的嚴肅性。巴依葉爾領導的建築設計托拉斯，他本人行爲不正，欺瞞上級，而省委不去揭露這種工作人員，反而包庇他，掩護他去損害我們事業。而且這樣的事實不是個別的現象。這不是鞏固紀律，而是使幹部教育受到嚴

重的損失。

正確的教育幹部，並不是用私人朋友關係來團結他們，掩蓋他們的缺點，姑惜他們的自尊心。黨的工作人員應該對自己有一基本的訓誡——不要姑惜個別的人員，不管他們有多麼高的職位，只是要尊重事業，尊重事業的利益。斯大林同志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在某些個別的情況下，領導工作者害怕別人責備他爲官僚管理，不敢嚴格的要求執行黨的指令。責難嚴肅性是多餘的，這只可能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只想輕鬆的生活，並在取得第一個成績之後，就昂頭天外，自滿自慰。假如一個領導者他是爲事業的利益而行動，他努力工作，他可以要求別人和他一樣，那麼，這種嚴肅性對他有什麼不好呢？

對缺點的嚴肅性及不調和性，只有那些真正不受官廳習氣影響的領導人，才是可能的。在工作中沒有原則性，對自己行爲不約束的工作人員，就使自己同那些阿諛奉承不正派的人同流合污了。這樣的工作人員在同缺點和罪過作鬥爭中表現了束手無策。這裏，相互包庇及溫情主義的風氣就代替了原則性和嚴肅性。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像溫情主義及互相包庇這種非布爾塞維克的習氣，會發生多大的害處，最後這些東西必至引向相互原諒錯誤。他說：「譬如說，某個組織的高級領導者張三，犯了很大的錯誤，並且把事情搞糟了。但是李四不願意批評他，不願意揭露和糾正他的錯誤。不願批評，是因爲不願意「給自己樹立敵人」。犯了錯誤，壞了事情，這有什麼要緊？我們大家誰能不犯錯誤呢？今天我原諒了他——張三，明天他就能原諒我——李四。因爲怎麼能保險我不犯錯誤呢？大家客客氣氣和平相處

多好哇。讓錯誤放過去，這就損害了我們的偉大事業嗎？沒有什麼！反正對付過去就行。同志們！這是我們某些負責同志常有的議論。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爾塞維克是批評整個世界的人，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翻天覆地的人，假如我們爲了使某些同志不麻煩而放棄自我批評，這除了傾覆我們的偉大事業而外，就不會有另外的結果，難道這還不明顯嗎？

什麼地方家庭式的解決問題佔了上風，那裏就沒有嚴肅性，那裏就容忍缺點和錯誤，甚至常常容忍罪過。

我們舉這樣一個例子吧。不久前，吉爾契支盟員共和國的國家監察機關，在檢查該共和國農業供給處的工作時，發現了亂分缺貨、私自供給、違犯財政紀律的事實，而該供給處把所規定對於機器拖拉機站、修理工廠、作坊、集體農莊供給機器及機器零件的工作做的很不好。吉爾契支共和國農業部的領導人，明知供給處工作做得很不好，而却自由主義地對待他底某些工作人員，沒有指出他們這種活動的重大損害，沒有表現必須的嚴肅性。如果問：這是爲什麼呢？就是因爲該農業部的領導者本身有時也參加了這種非法的行爲。他們不按規定，比如把配給機器拖拉機站、農業技術學校，及普通學校的很大數量的布疋浪費了，而且把一部份分給了農業部及供給處的工作人員了。還亂分了其他的物品，很大一部份已經發到供給處的分解機（製奶油用的）沒有給集體農莊的牧畜部，却落到私人的手裏去了。

由於這些原故，該部的領導者在某種程度上就和下級供給處的工作人員有了牽扯，而在同他們工作中的嚴重缺點作鬥爭中就失去了武器。這一點說明了，同自己監督下的人員的互相關係中，領導者

思想上的純潔是如何重要啊！

黨的工作人員是給各個工作部門的幹部在工作上指示方向的。斯大林同志關於蘇維埃的黨的監察人員說過的話，對於黨的工作人員比對任何其他的人員更爲重要。斯大林同志說：『他們應該純潔無瑕，追求真理，以求他們不僅能夠有形式上的權威，而且要有思想上的權威來審查和教育別人。』

思想教育教育幹部在工作中的嚴肅性及對缺點之不調和性的最重要條件。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能够深刻了解黨的政策，而因此提高每個工作人員的責任心和對國家義務的感覺。只有自覺的和思想有鍛鍊的人才明白自己對黨的義務，明白自己對黨所負的責任。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高度的嚴肅性，過去會是，現在也還是正確教育幹部的基礎。

（譯自四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真理報）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

多爾庫諾夫

是布爾塞維克高貴的品質

我們生活和工作在無階級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完成，以及由社會主義逐漸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代。爲更加光明的將來的前途所鼓舞着的我國勞動者們，表現了極大的主動性，及日益不斷增長着的政治的和生產的積極性。這種積極性在斯塔漢諾夫運動底更高的形式中；在工業和農業各部門無數革新者底生產業績中，在蘇聯學者、文藝工作者底成裏，都得到了自己底表現。蘇聯人民底多方面的才能是日益廣泛地展開了，因爲蘇維埃制度給我國人民底發展及創造勇氣以無限的可能。

我們底黨，是革新者底黨，革命者底黨，這個黨敢於推翻陳舊的標準，而接受新鮮和前進的事物。

顯然，一種新鮮的事物，在生活中被接受，並不是自流地、自發地，而是在緊張的、不斷的鬥爭中形成的。扶植一種新鮮的事物，以一切力量鼓舞它，給與它以一切生長和形成的條件，這便是每一個布爾塞維克底義務，尤其是每一個黨底領導人底義務。

斯大林同志把對新鮮事物的感覺，稱之爲每一個布爾塞維克工作人員底高貴品質。然而掌握這種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什麼意思呢？這首先就是說要善於看到未來，不是墨守成規，而是依靠那種雖然

幼小，但却在上升着的事物，這就是說，不要滿足於已經獲得的東西，而是不斷地向前進步。

有許多黨底領導人總是抱怨說：日常工作佔去了他們底全部時間，這就使他們沒有可能深思熟慮地去考慮本區、本省底發展前途問題。在大多數的情形下，這種現象發生在這樣一些人們的身上，他們企圖把一切事情都自己親手去做。他們不善於配合那些在他們負責領導下的各個不同的工作部門的工作。黨的工作人員，不應該包辦一切，代替一切。他是一個政治領導者，他底責任在於把握的、蘇維埃的、經濟等各機關的一切力量推動起來，給以需要的方向，並督促他們能在實踐中堅決地執行決定。只有這時，一個黨的領導人才能夠從瑣碎的、次要的工作中解放出來，而集中精力在那些主要的、決定本區或本省未來發展的工作之上，深思熟慮這些發展前程，去利用經濟上的可能性。

在這方面，一個區或一個省的計劃問題有着重要的意義。要製定計劃，不單是只照顧到今天的任務，而且要看到明天。這就是說，在每一區的經濟發展上要執行一定的政策。計劃就是這種經濟政策的表現。那些全心全力去搞各區發展前途的黨委和省委，他們就是做得對了。

例如，去年聯共黨莫洛托夫省省委，召開了一個討論發展本省生產力問題的科學代表會議，全國著名的學者都參加了這次會議。莫洛托夫省有什麼天然寶藏可以開發？那些工廠需首先建立起來？工程師和技術員應該按着什麼方向進行工作？諸如此類以及許許多多其它的問題，該省的工作人員都得到了必要的答覆。正因如此，黨的領導人才能够在自己底面前，提出具體的任務，推動黨的和財經的機關去解決最急迫的問題。

向前看，這就是說，對自己已經做過的東西給以估價，但並不是把它當做固定的總結，而是把它

當做向前推進運動的出發點。有些領導人，當他們給某一運動做總結時，總是忘記事情底這一重要方面。他們通常只是把積極和消極的現象加以羅列，痛罵缺點，提出許許多多的數目字。在這裏便忘記了關於新鮮事物底生動活潑的例子，這樣的例子在任何一件大事中都有的。而發揚這種新鮮事物，澈底分析它底產生條件，把社會輿論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這就是為更形加速的，前進的運動向新的勝利之發展，建立了補充的源泉。

自然，當一個新的事物在它開始發生時，是不容易觀察出它底萌芽的。列寧在他底「偉大的開端」一文中寫道：『當一個新鮮的事物剛剛出生時，舊的總是存留下來，在某些時間內，還比新生的強大，這在自然界中和社會生活中總是如此……我們必需仔細地研究新底萌芽，極其關懷地去對待它，用一切方法幫助它底生長，並「扶育」這些幼小的萌芽。』

為了及時發現新鮮的事物，為其迅速的生長奠下基礎，就必需具有敏銳的感覺。有時，某一件事情，在我們按其長處給以估價之前，常是經過巨大的誕生的痛苦的。那些懼怕份外的操勞和努力，慣於和平和平，按照舊秩序生活的人們，靠得住就是漠不關心新鮮事物的罪人。很自然的，這樣的工作人員對於新鮮事物的感覺是遲鈍的，他們是更多地傾向於陳舊的東西，他們早晚有變成墨守成規的人，保守主義者的危險。

就拿砂糖工業管理總局的工作人員做例子吧。他們成年成歲地把許許多多的寶貴建議擱置起來，而這些建議如果實現的話，就能額外地給國家以幾千普特砂糖及節省千百萬盧布的開支。而在砂糖工業管理總局裏，把狹隘的本位的利益置於全國利益之上，他們不但不支持這種寶貴的倡導，而且相反

地，去阻礙它們。甚至於在蘇聯輿論界發表了尖銳的批評之後，在砂糖工業管理總局裏仍然繼續存在着對待新發明拖擱不用的現象。可以設想，在這些地方墨守成規及保守主義是多麼根深蒂固。而這是爲什麼呢？這就是因爲砂糖工業管理總局的做領導工作的人員，脫離了實際生活，失去了對新鮮事物的感覺。

工作經驗，與羣衆的連繫，善於從國家底要求出發去對待每一件事情，這些東西便給一個工作人員以對新鮮事物的敏銳的感覺。幾年以前，庫爾斯克省的幾個集體農莊開始採用了勞動組織之小組制。當時省委領導人常常到各區裏去，仔細傾聽集體農民的意見和他們底提議。省委決定把這些零零碎碎的經驗普遍化起來，而且決定這個工作必須由省委來做，因爲省委和所有的區，所有的經濟的，蘇維埃的，黨的組織聯繫着，因爲正是在省委手裏牽着主要的領導線索。

省委當時就全心全力地研究了勞動組織的小組制。在集體農莊內給每一小隊固定了經常由他們耕種的土地，農具和牲畜。給各小組固定了由他們管理的作物：栽植作物，技術作物，菜蔬，有時還規定了種植穀類作物。勞動償付中的平均主義被消滅了，收入按每一小組所獲得的收成進行分配：獲得較高收成的集體農民小組，得到較高的報酬，而獲得較低收成的小組，則得到較低的報酬。

在研究勞動組織小組制的時候，集體農莊農民的經驗又被黨的領導人底政治經驗所支持並被導入了正確的道路。從一開頭，省委就了解不但有必要用一切方法促成新鮮事物的產生，而且要幫助它形成，生長和鞏固。省委不止一次地寫信給集體農莊主席們，集體農莊黨的書記們，村鄉地方黨的組織，小隊長們，告訴他們如何正確地組織勞動，如何採取按件工資制，如何分配收入，並如何去廢除

非個人負責制及平均主義。

很可惜，並不是到處都能很注意地傾聽羣衆的呼聲，並把羣衆的經驗普遍化起來。有時便只局限於去寫些鼓勵個別斯塔漢諾夫式工作者及個別單位的決定和指令，形式地給自己保了一險，以求避免受到工作不活躍的責備，但實際上對於採用和鞏固新生事物方面，並沒有做任何工作。這種對待工作的態度，不能發揚主動性，而只會停滯它，絞殺它。

我們黨的組織，在深入的利用斯塔漢諾夫運動前進形式及新的工作方式等方面，已經積蓄了巨大的經驗。這些經驗告訴了我們什麼呢？它告訴我們說，必須每天都去幫助那些採用新的勞動方法的人們，給他們掃清被墨守成規，保守主義所阻塞了的道路。但是，只去幫助一兩個斯塔漢諾夫式工作者還是不夠的。前進者底經驗必須爲全體工人所享有，只有這樣，這種經驗才能獲得全民的意義。雖然如此，然而收集斯塔漢諾夫運動的經驗，把這些經驗普遍化，加以傳播，遠非所有的地方都做到了應有的程度。一般來說，這些進步的經驗，很快就被頌揚一番，然而並不是都能找到其中細膩的，科學技術的根據，而這種根據恰能够成爲生產中的工作方法和規則。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從黨的工作本身發生的，黨的工作就是在共產主義的建設中團結勞動者爲着新的勝利而進行鬭爭。黨的活動是不能容忍定型和停滯的。創造的熱情在一個黨的工作人員來說，是固有的；他批判地估價自己底經驗，經常地查檢自己底經驗是否適合於新的任務和要求。一個具有對新鮮事物感覺之黨的工作人員，從來不漠視別人底經驗，並不以學習和掌握別人底經驗爲可恥。有些所謂「絕無錯處」的工作人員，他們認爲自己沒有什麼可以向別人學習，也沒有誰值得他去學，他們

把自己底眼界只局限於個人的經驗之內，把自己封鎖在自己底有限的學識的圈子裏，於是他們就老是僵在一個地方了。

當一個工作人員不斷地去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的時候，這種對新鮮事物的感覺就日益鋒利和敏銳。馬列主義能幫助我們認識在胚胎中的新生事物之萌芽，並按其長處去估價它們。這種感覺是由永遠生動活潑的，永遠發展着的馬列主義本身產生出來的。馬列主義教導我們說，在新鮮的和陳舊的，垂死的和新生的，衰老的和發展的之間的鬭爭，就組成發展過程的內容。研究馬克思主義，一個布爾塞維克就能深刻地認識黨底要求，黨底領袖列寧和斯大林底要求，就是要求我們注視生活中出現的新生的事物，就是要求我們不去依據那些陳舊、衰老的，而是依靠年青的，發展着的事物。學習馬列主義的意義，對幹部底實際活動來說，是無法估價的。馬列主義的理論，用預見和辯認前進事物的能力，以及爲其形成和生長創造一切條件之能力武裝着布爾塞維克。

在我們底社會裏，正在進行着新鮮事物之誕生，及其與舊的事物鬭爭之不斷的，羣衆性的過程。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摧毀衰老、落後事物的方法，就是爲培養新生、前進事物而鬭爭的方法。斯大林說：『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這個真理是純潔的，明澈的，有如泉水那樣純潔，明澈。』展開對落後的批評，責備墨守成規的份子，布爾塞維克就是給新生事物及其鞏固肅清道路。

戰事結束以後，在黨的面前，出現了新的任務。蘇聯人民正全心全意努力爲祖國做他們力所能及的一切。他們每天都給自己底勞動方法帶來新的東西，這些新的東西使我們能更迅速，更有信心，更順利地向前進步。及時地發現這些新鮮的東西，維護它，使它能廣泛地傳播開來，任何時候也不滿足

於自己底創造，鼓勵羣衆的創造熱情，這就是每一個黨的領導人，每一個布爾塞維克之最崇高，最光榮的任務。

（洵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報）

論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

斯列波夫作
亞天譯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說，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我們的黨不能容忍有絲毫的不堅定性與無原則性的表現，要求我們工作人員能經常不打折扣地完成自己的任務，經常站在政治活動家的崗位。

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就是對一切稍微脫離黨的原則，思想和政策的傾向之不可調和的精神。黨的政策是蘇維埃制度之生命的源泉，黨的工作者在自己一切大小工作中，均應以黨的政策為行動指南，從政治的、原則性的路綫出發。

列寧教導我們說，政策是從聯繫到千百萬人利益的事情出發的。有原則地、從政治上去對待問題，就是說要從千百萬人及他們之間相互關係的觀點來觀察問題。這就不能在本位主義的、地方性的、朋友關係等利益面前作絲毫的讓步。布爾塞維克重視友情、同志關係，但是他認為評定一個人行為的最高標準是看這個人如何對待由蘇維埃國家所代表的人民利益。

列寧寫道：『我們承認同志間的義務，承認有援助一切同志的義務，承認有耐心聽取同志們意見的義務，但對我們來說，同志間的義務是從對俄國的和世界社會民主黨的義務產生出來的，不能把它顛倒過來。』（列寧全集，二卷，五四一——五四二頁）

由此可見，在原則性的精神上教育幹部，這就是說必須作到：在決定任何問題時，幹部不是從私人的或地方的利益出發，而是從國家的利益出發；在一切場合堅持這種利益，並與反國家的傾向作鬥爭。每個工作人員底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表現在他對自己所擔負工作之態度上，而檢查他的原則性，就看他是否把自己的工作服從於國家當前的重大政治任務。評定一切措施的標準是：這些措施是鞏固還是削弱我們的偉大事業。促進這種偉大事業的繼續發展還是妨礙其發展。這一點也應作為測量一切工作人員之布爾塞維克原則性的標準。

現在在證明着，不善於正確判斷各種現象和不善於有原則地對待問題，會受到嚴重的損失。拿『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編輯部所犯的錯誤為例來說——這些錯誤被聯共中央及時地揭發了。這些錯誤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領導工作人員不是把正確的教育蘇聯人民和政治上指導文學工作者的活動的利益作為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而是以私人的、朋友的——就是說，庸俗的利益為其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由於他們不願意破裂朋友的關係，所以他們對沒有價值的，反藝術的，脫離政治的作品不作批評。由於他們害怕得罪朋友，便登載了非常不適當的作品。聯共中央的決議裏說道：『這種自由主義，把人民的與國家的利益，正確的教育我們青年的利益作了朋友關係的犧牲品；它閉塞了批評。結果是：作家們停止繼續深造，喪失他們對人民、對國家與對黨的責任感；他們也就停止前進了。』

或者我們再拿對外國阿諛逢迎的事實來看一看。很顯然，我們一部份落後的知識份子，還沒有擺脫掉這個可恥的毛病。一些黨的和經濟的領導者們，不用蘇聯民族自豪的精神來教育人們，却對媚外

的奴顏婢膝事實謀妥協。這還不是無原則性的表現嗎！

這說明，需要在一切問題上表現原則性。在黨的工作中尤其必要。從政治上處理問題的態度——是黨的工作中的基本態度。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黨的生活與黨的工作之基礎，不在於黨在當時所採用的或能够採用的那一些組織形式，而在於黨的政策、黨的對內和對外的政策。」（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四一九頁。）這就是說，我們的工作人員應當不僅是好的組織者，熟練的實際工作者；而且也是政治上成熟、思想上堅定的人。

深刻的思想，對馬列主義偉大思想之正確性之堅定的信念，便是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之基礎。只有在原則上堅定不移，很好的掌握了馬列主義的思想的人，才能具有戰鬥的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才能從黨的原則立場上去對待問題。

馬列主義的理論給予幹部以光明的前途，使他們在工作中具有信心；這種理論發展他們的才能，使其能從小的事情看到大的事情，能於日常的、眼前的工作中感覺到是在爲了偉大的理想而鬥爭。反之，對理論不關心的態度便會使其失掉前途。論到不關心理論的人們時，斯大林同志說過，他們有從政治活動家變成爲政治上的庸人，變成無原則的脫離政治的事務主義者的危險。斯大林同志說：「關於這種游離不定的人們，偉大的俄國作家果戈里會頗中肯地講過：『那些沒有定見的人物，是既非此，又非彼，反正你不能理解他們是些什麼人，簡直是非驢非馬。』」（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六九〇頁）

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乃是在思想上、原則性上教育我們幹部的的方法；同時也是提高他們戰鬥

力的最重要方法。偉大馬列主義的思想，乃是我們幹部精神力量之活的源泉，是幹部之堅決性及其在克服困難中永不枯竭的精力之活的源泉。實際的經驗在在都證明着，思想開展的人們在實踐中也是有力量的；他們在工作中有更大的信心，暫時的失利不能使他們灰心，他們堅強地向既定的目標前進。正因爲如此，黨便要求我們的幹部有系統地，努力地進行自我學習，以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

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是一種對一切缺點的不能容忍性，它是在高度嚴肅性的情況中養成的。關於以原則性的精神教育幹部儘管高談闊論，但如果黨的委員會不表現足夠的嚴肅性，姑息地對待工作人員的錯誤，那他便會給布爾塞維克的幹部教育招致嚴重的危殆。比如，在伏羅希洛夫格勒省黨委中便存在着這種實際情況。不久以前，國家計劃局的代表揭發了「克拉斯諾頓煤礦」托拉斯和「卡基也夫煤礦」托拉斯兩企業中多報礦井中採煤量的事實。他將這些通知了聯共省黨委的領導同志。據估計，將會加以處理。但省黨委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原則性，沒有注意兩企業中領導者違犯國家利益的行動，沒有使他們受到處分。

作一個有原則性的人——就是說不怕得罪任何人而直爽、誠懇地指出他的缺點。領導者應當善於「用布爾塞維克所固有的那種全部直爽態度發表自己的意見……」『像布爾塞維克那樣明白而公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問題，十一版，三九八頁，一四四頁）同時，有原則性的人，他本身也不怕勇敢的、坦白的、客觀的批評。

批評乃是布爾塞維克的幹部教育方法的靈魂，在對批評的態度上也可以檢驗一個工作人員底原則性。一個工作人員不能把布爾塞維克的、有益的批評看作是對自己的侮辱，看作是對自己的威信的損

害，因而把自尊心看得高於工作的利益。他應當有勇氣批評別人，也善於勇敢地接受批評。

『任何一個組織沒有批評的話，都會腐朽的。沒有批評，則任何毛病可以滲入膏肓，較難治療。只有大膽的，公開的批評，才能幫助人們變得日益完善，才能促起人們前進，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凡是沒有批評的地方，那裏便從根本上腐爛發霉，停止不前，那裏便沒有可能前進。』（日丹諾夫）

可惜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對批評的不能容忍態度，竟以報復所謂『欺侮者』相威脅，而有時竟然實際地威脅起來了。可舉這樣一件事實為例：黨員伊萬年科同志會同其他一些同志正確批評了莫斯科——庫爾斯克鐵路配車處的工作中的一些嚴重的缺點和該處處長斯米爾諾夫同志。斯米爾諾夫不去傾聽批評與按照布爾塞維克的精神改正工作中的嚴重缺點，反而把伊萬年科同志的工作辭掉了。甚至當伊萬年科奉部令恢復了工作之後，斯米爾諾夫却硬降低了她的工作職位：按她的專門技能本是工程師，現在却要她當統計員。奇怪的是，鐵路局黨組織的領導者們對此熟視無睹，事實上是助長了斯米爾諾夫同志的不正確行動。

不能容許這樣一種用處理家務事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的情況之存在。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解決問題，妨礙對缺點的揭發與糾正，對教育做偽政治活動家的工作人員是有危害的。

缺乏原則性，沒有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有時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在庫爾罕省黨委的實例中可以看出得很明顯。該省黨委的前任書記沙拉波夫同志，以朋友關係代替了工作中的黨的原則性。省黨委中形成了一種一團和氣，泰然自若的風氣，黨的與蘇維埃的積極份子中間出現了無紀律性與放蕩散漫的份子。沙拉波夫同志自己不關心工作。竟有這樣的情形，當農村工作火熱的時候，他却去找

自己的朋友和熟人遊逛去了。這樣得到了什麼結果呢？結果是：在該省許多區裏播種進行得不好，收割與交納糧食的工作也準備得很不好。省黨委的委員們都知道這一切情形，但對省黨委領導者所養成的這種非布爾塞維克的習性不進行反對。這樣便表明了他們是無原則性的人，是庸人，而非政治的活動家。

無原則性的工作人員，其結果往往是失掉獨立與自動性。追求物質享受的工作人員，把自己束縛起來，失掉了批評別人的可能性。庫爾罕省黨委的委員們在對省委書記的關係上表現了無原則性。就因為他們中間有一些人，按着沙拉波夫同志的提議，幾度獲得了獎金。這也是他們彼此互相原諒錯誤的原因之一。

無原則性、庸俗化，也常常是不遵守布爾塞維克原則挑選與分配幹部的結果。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要根據政治的標準來挑選幹部——就是說，要看該工作人員在政治上是否是可靠的；也要根據業務的標準——就是說看他是否適於這樣一種具體工作。凡是違反這些原則的地方，凡是挑選幹部只根據家庭的、庸俗的、朋友的關係，不管他們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適當，那裏便要替吹拍逢迎與在工作中互相包庇缺點造成有利的條件。得到的不是在原則基礎上的領導核心，不是負責的工作人員的領導集團，而是親近人們的小家庭，而是這樣一種組合，它的組員都力求和平共居，彼此不相得罪，家醜不可外揚，互相吹噓……」（斯大林）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談不到對工作人員的高度嚴肅性。在烏梁諾夫斯克有很多事實表現出了嚴重的缺點。比如，城市管理無人過問，居民們常常沒有燈光，自來水忽有忽無，滿街是髒東西。省委書

記德林吉也夫同志對此熟視無睹，對於城市管理失職的罪人表現了自由主義的態度。這一切，正因為德林吉也夫從前曾在遼東工作，當時他便隨身把幾個對於他是『合適』的工作人員帶到烏梁諾夫斯克來，現在，他對於這些人的工作也未表現出足夠的客觀態度，而因為朋友關係對他們就百般地原諒了。

對幹部進行思想教育，這是我們當前的重大任務。新的幹部不斷地增長起來，必須以布爾塞維克的傳統教育他們，發展其優良的品格與品質。高度的原則性與理論性，乃是列寧——斯大林式的工作人員之卓越的特點與最重要的品質。以原則性與克服困難的堅決性教育幹部，將會促進更加順利的實現新五年計劃的任務與在我們國家內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

（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真理報）

論忠誠與老實

著作者 斯列波夫等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白城子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廠

每冊定價一元五角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再版。10000。



為忠誠與老實

1948.4.再版 佳5001-15000.

定價：150元